

文庫博物館專集（五十五）

1967年初，中共中央指示派往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向所在国的有关方面请假半年，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65名留法学生和4名留芬兰学生于1月24日晚先后抵达莫斯科，准备乘26日的中国火车回国。25日全天没有安排。1965年我们赴法国路过莫斯科时曾去红场瞻仰过列宁的遗容，这次还去不去

呢？多数同学认为，我们是专程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而“文革”的目的就是“反修防修”，此时再去瞻仰革命导师的遗容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决定25日仍去红场，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

既然是一次“反修”斗争，就得有所准备，以免临时慌乱。大家心里清楚，当时中苏关系已严重恶化：1966年1月苏联大量派兵进驻蒙古，并在蒙古积极建造军事基地；2月中共拒绝参加苏共23大，中苏两党关系中断；10月苏联单方面宣布全体中国留苏学生集体休学，并限令当月内离苏；1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名道姓攻击毛泽东，并通过反华决议。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在国外，“红卫兵”的名声不大好，被视为洪水猛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留学生手举“小红书”（外国人对《毛主席语录》的称呼）走进红场，抬的花圈中还有一个是献给被他们否定了的斯大林的，出事就不是万一，而是一万了。但是既然要“革命”，就不怕出事，不回避斗争，因此也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比如在列宁墓前排队时，让女同学和体弱的男同学站在队伍中间，身体高大强壮的男同学站在外圈。

25日午饭后，约12点半我们从使馆出发。同时，使馆用电话通知了苏外交部。车行20分钟即达红场。天气阴沉沉的，冷得很，大概在零下30度。红场上的参观者已经排着一字长蛇阵，直达列宁墓门。在一名苏军少校的带领下，我们抬着两个花圈列队进入红场。等了一阵子，警官把我们插进参观者的行列，在我们身后又排上几百名“参观者”（后来我们得知都是便衣特务）。这时，苏警官不许我们把献给斯大林的花圈抬上列宁墓，强迫我们把它放在陵墓一侧的小道上。

我们在列宁墓门前的大理石平台上排成方队，献上花圈，开始脱帽默哀。还不到一分钟，苏警官就气势汹汹地喊：“够了，够了！”默哀后，按计划我们要朗诵事先准备好的两段毛主席语录，唱“国际歌”。一个同学走出队伍领读，他高声喊道：“请翻到‘毛主席语录’第22页。”哗，每人都捧起“小红书”。“最高指示：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突然，两个军警冲过去，左右架住他嚷道：“红场是个严肃的地方，不许大声喧哗！”使馆领队同志和翻译即上去交涉。这时队伍中立刻又站出一个同学接着领读起来：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将必然取得胜利。”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这两段语录都是针对当时所称的“苏修领导集团”的。响亮的声音在红场上空回荡。苏军少校恼羞成怒，气得关上了列宁墓大门，同时向大批武装警察和我们后面的便衣特务招手。这些人蜂拥而上，推推拉拉，企图冲散我们的队伍。我们69人手挽着手，放开喉咙高唱“国际歌”。警察们气急败坏，把我们一个小个子同学架到红场中央，劈头盖脸地打，然后推倒在地，用大皮靴连踢带踩他的胸部。其他同学冲上去营救，队伍散了。在苏军几名中校、少校的指挥下，二三百名警察和士兵将手举“红宝书”的我们、使馆陪同人员、新华社记者等分割包围起来，三四个人围着一个人，拳打脚踢，乱打乱撞。几个士兵把我们的花圈撕得粉碎，一位女同学上前阻拦，被一个军官拦腰抱住，摔倒在地。有几个士兵学着样子，抓住女同学的小腿或腰部，扔进红场边上的雪堆里。地上到处都是我们的眼镜、围巾、鞋和帽子。同学们互相搀扶着，义愤填膺地高呼：“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列宁主

义万岁！”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69人不论男女全遭毒打，30多人受伤，9人重伤。随行女翻译高呼口号，苏联警察拉住她围巾死劲勒。他们还阻止新华社记者照相，妄图夺走相机和胶卷。我们冲上去极力保护相机，才使记者摄下的苏方军警的法西斯暴行得以保留下来。

约半小时以后，驻莫斯科的各国记者和不少市民闻讯赶来。红场周围人山人海。苏军警的暴行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几个苏联老人喊道：“不要打他们！他们是学生！”有些苏联工人还帮助我们撤出包围圈。

下午13时45分我们撤离红场。当大轿车行经闹市区，我们打开车窗，将拳头伸出窗外，拼命高呼“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米高扬！打倒柯西金！”等口号，高唱《国际歌》。晚上，在使馆电影厅召开了“控诉苏修血腥镇压我留欧学生罪行大会”。驻莫斯科的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使馆都分别派医生来中国使馆帮助救治伤员，表示同情和支持。

回国旅途中传来周总理的慰问电，外交部抗议声明及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的系列消息，更增加了我们进行绝食斗争的勇气。

斗争在火车上继续进行。

1月26日下午3点50分，我们60名受轻伤和无伤的同学乘火车回国（9名重伤员另乘飞机）。伤了筋骨的，脸上有伤的，该拄拐杖的就拄拐杖，该包扎的就包扎。一些无伤的，也都拄根棍子，故意瘸着跛着走路。使馆给我们每人胸前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送行。苏方则在我们前边用摩托车“开道”，两旁警车“保驾”，后面是装有对讲机的小轿车压阵。几十公里，一路绿灯。几十名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学生，弄得他们无可奈何。

许多外国记者在火车站等着我们。有人请我们讲昨天红场斗争的真相，进行录音；有的用照像机拍摄我们的伤情。我们仍是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声朗读昨天在红场上的那两段，放声高唱《国际歌》，喊口号。苏警察不断大喊：“不许你们扰乱社会秩序！”我们根本不予理睬，仍使劲喊、读、唱，吸引许多旅客围着我们看。

中国火车在苏国土上行驶，挂的是苏联餐车。我们去吃饭时，发现每个餐桌上都放着中文的反华小册子，诸如《关于中国的事件》，《莫斯科新闻》，《中国红卫兵在红场上》等等。我们立刻派出代表向苏方列车长和餐车主任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刻撤掉小册子。他们口头答应下来，但下一次吃饭时，他们不但没撤，而且加多了份数。我们又一次提出强烈抗议。苏联列车长威胁说：“要知道这是在苏联领土上，再这样下去，就不给你们吃饭！”这种蛮横行径，激起我们极大愤慨。大家一致决定绝食。我们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在苏联的旅程中，我们坚决不去餐车吃饭。就这样，我们60名同学，9名援阿尔巴尼亚专家，以及全体乘务员，此后再没喝苏联一滴水，吃苏联一片面包。

27日，列车广播里传来了周恩来总理给我们的慰问电，传来了我国外交部发表的“最最强烈抗议苏修疯狂镇压我留欧学生”的声明，还传来了《人民日报》社论和国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的一系列消息。大家万分激动，个个泪流满面，更增添了我们进行绝食斗争的勇气和信念。

30日晚7点抵达苏边境站拉乌斯基。在这里要进行出境检察。这里警戒森严

，不许随便说话。我们哪管这些，这边苏联检查人员一上车，我们将包厢的门全部打开，接受检查；而那边一个车厢的同学就齐声朗读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是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气得苏方检查人员目瞪口呆，又无可奈何。

3月1日晨6时许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中国驻蒙古使馆的同志带着面包，馒头，罐头早等待在站台上。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使馆的同志说：“你们为正义为真理绝食，好样的。你们辛苦了！”不少同学感动地流着眼泪说，有毛泽东思想和全国人民鼓舞着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饿。

2月1日下午2点，我们终于回到了北京。陈毅副总理代表中央到车站迎接，和我们一一握手，在车站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给我们每人左臂上套了个“反修红卫兵”的袖章。陈毅亲自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穿着厚厚的军大衣，带着棉帽子放下帽耳，显得笨拙而可亲可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被誉为“反修战士”。

2月11日，在工人体育场，周总理主持召开了“首都革命造反者欢迎我国留学生声讨苏修法西斯罪行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此后，这场事件的宣传逐渐冷清下来。

抚今忆昔，那当年狂热的革命激情已回归于理智的思索，这才意识到我们当年的偏激和幼稚。“1967年莫斯科红场流血事件”本来就不该发生。从我们这方面讲，其根源是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正如《中国共产党70年》一书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工作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在对外交往中，也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典型的例子是1967年8月在北京发生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事件，造成我国与西方关系紧张的局面。设想一下，假如我们遵照苏方的有关规定，在红场上没有读毛主席语录，唱《国际歌》的举动，流血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在当时，这种设想是不现实的。

回想在巴黎时，虽然我们远离祖国，但是每天晚上10点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欧的普通话广播；从法国报纸上和电视中也不断听到和看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和场景。在街上偶然碰到从中国回去的法国人，有的还臂戴“红卫兵”袖章，头戴缀有红五星的帽子，绘声绘色描述中国的形势。无论法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到处在谈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红书”。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为此，巴黎某大学的学生组织曾牵头召开辩论会，辩论“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世界文化，人类文明是个大促进，还是大促进？”并邀请中国留学生参加辩论。中国部份留学生和进修生经过充分准备到会发言，大力抨击“大促进”派，使大会最后表决时，“大促进”派占了多数。对同学们更具有感召力的是国内来信，说什么如果不参加这场“大革命”，将是终身最大的损失和遗憾。……

以上种种，使绝大多数同学不安心学习，渴望回国参加“文革”，风风火火地进行“造反”。有极少数同学已经行动起来，到使馆贴什么“小字报”，说使馆执行了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1月18日黄镇大使专程到留学生驻地传达中央关于同意所有留学生回国参加“文革”的文件时，同学们真是欢欣鼓舞，磨拳擦掌，象渴望打仗的战士马上要开赴前线一样。我们是带着这种强烈的“参战”意识，从资本主义的法国到当时称为“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中心莫斯科的。正如同学们说，这是到了修正主义的老巢，反修斗争的最前线。所以红场上的行为完全是国内红卫兵的那一套。正如回国后我们的一位代表在向某高校作报告时说：“红卫兵就是要杀向人类世界的一切蠹贼，涤荡一切残渣余孽，砸烂整个旧世界！今天中国的红卫兵来了，来到列宁的身边，带着毛主席的教导，怀着横扫一切牛鬼

蛇神的豪情壮志，以倒海翻江卷巨澜的大无畏气概，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勇猛杀来了！红卫兵威振莫斯科！”听听这就是当时的语言，当时的情绪。在这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的情绪支配下行动，不出事才怪呢。

当然，前苏联当局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两党，两国关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一开始就对中国留学生抱有敌意，军警和特工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可以说居心叵测，蓄意制造事端。对于赤手空拳，在列宁墓前只是念念毛主席语录，唱《国际歌》的书生们拳脚相加，大打出手，实属野蛮，有失人道。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也是咎由自取。

好在这一切都成为遥远的过去，当“左”的幽灵不再在我们头上徘徊时，这样的悲剧，闹剧就将永不发生。

~~~~~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编者按： 本刊有幸在此发表文革中清华“四一四”派主要理论家周泉纁在今年初所撰写的对文革的反思〈我心中的文革〉一文（部分内容曾由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刊载）。作为文革的积极参加者，周泉纁表达了他今天对于三十多年前那场运动的评价和反思，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为今天有兴趣于文革历史的人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材料，对照他在当年发表的观点（见本刊连载《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八章）来阅读，尤其给人启发。〕

## 我心中的文革

• 周泉纁 •

因为某种机缘，有幸拜读了唐少杰的文章——《清华大学两派的分歧》。此文以我在文革中写的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为主脉络，展开作者的论点。我认为这篇文章史料是真实而充分的，清华大学文革的历史地位和主要脉络也已经讲出来了，因此应该说是篇文革研究的好文章，它可以帮助后人从理论高度更好地认识文革历史之真相。

我现在虽作文革研究，但主要精力没有去从事有关文革研究的具体写作，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评论文革时机还未成熟。现在看来文革的实质已经开始全面的显露出来，因此及时地揭示文革的实质对社会进步无疑是有益的，同时历史的发展也已经能让大众理解文革的实质了。所以，今天我想以一个当年很自觉地搏杀在文革第一线的、典型而有特色的红卫兵小将的身份，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思想演变过程，对文革作一次总的评论，或许这对与我不同年龄层的朋友研究文革多少会有点帮助，同时也算是对唐少杰文章的一个回应。

### （一）

文革现在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历史。

我认为任何人心中的历史都是主客观统一的历史，世界上不存在纯客观的历史，也不存在纯主观的历史。千千万万人心中的历史汇集综合起来就成为真正的历史。所以，执政者心中的正反文革史与红卫兵、老百姓心中的正反文革史内涵是不同的，但是它们的内涵不同并不等于它们不正确，不同的人心中的文革史对他自己来说都正确，问题在于具体人心中的文革史内含文革的真谛的有多大，从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价值又有多大。

一谈到社会价值，无疑涉及到社会利益问题。所以，唐少杰文章中讲文革里的清华学生的思潮分歧代表社会利益的斗争，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抓住了文革历史的主题，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从理论上展开这个历史的主题。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没有文革的深层次的经历和对文革理论没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的青年人来说是很难的。原因不是他们的才华和热情不够，而是他们手里的历史资料不全。这也是现代人研究现代史最大的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今天的文章可能是研究文革史的青年的难得的一个史料。

## （二）

关于文革，我必须从我的出身说起。

我的祖父是浙江诸暨县的一个地主。我父亲是傅作义手下的一名起义军官，后来因为肃反扩大化而坐牢，这件事一直到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平反。我外婆是一个富裕的小商人，她老人家是我人生的启蒙导师，她教育我的理论就是她信仰的一些佛学道理。我母亲是一个奋斗型的小学教师，解放初她与父亲离婚后远离家乡去新疆开发石油，从而使她能用当时的边疆高薪把她的四个孩子轻松地培养成人，她在文革中作为“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分子”挨斗坐牢吃尽了家破人亡之苦，但由于她万事想得开，平反退休后生活和身体一直很好。所以，在文革中我无疑属于“狗崽子”之列，但这并不影响我在文革沙场上纵横驰骋，原因是我从幼年起就有强有力的理论信念支撑自己的灵魂。

讲文革无疑离不开文革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我现在虽然对毛泽东的很多思想在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是我唯一崇拜的共产党领袖。我认为毛是共产党内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真正吃透的为数不多的人，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有自己理论理想的人。毛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认为这句话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实质，也高度概括了文革的理论实质。而这个“造反有理”论正是我人生的最重要的理性起点。

回想我的童年，当我母亲手抱着弟弟、而我拉着妹妹的小手与地主分子一起排队去劳动改造的时候，当我在学校里因为家庭成份不好而倍受学校的歧视的时候，我对穷苦百姓对我的祖父和父亲造反有理这个真理是很不理解的。因此当时我非常痛苦，甚至难以自拔。后来是我的老外婆的佛学思想拯救了我的幼小的灵魂。

老外婆告诉我，众生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但有的人前世或今世欺压老百姓，老百姓就来报复他们，这就是冤缘报应。所以外婆认为贫下中农造我父亲家的反是有理的。而要像我这样无辜的孩子不再受父辈被造反的连累之苦，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永远记取父辈报应的教训，永远不去欺压老百姓。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显然，外婆的“造反有理论”是从佛学的“普度众生论”演化而来的。

后来我在哲学上经过突破性的研究，才发现佛学的所谓“普度众生论”原来就是宇宙普遍联系法则（宇宙大统一法则）在社会问题上的表述方式。正因为如此，当年幼小的我才能凭着自己的天性，心悦诚服地接受外婆从佛学“普度众生论”演化来的“造反有理论”，从而使这个理论就象一颗种子深深埋在了我幼小的灵魂里。

现在回想起来，我长大之后对毛泽东的崇拜，对共产党真心的拥护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原则上都起源于外婆在我心中埋下的“造反有理论”的种子。同样，我在文革中的全部政治方面的言论和行动，归根到底也是来源于这颗“造反有理论”的种子。用文革的语言讲，我当时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的信条，才是文革的“造反有理”的唯一的理论的解释。

### （三）

“文革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关于这个概念我在文革开始时并不接受。我认为王光美控制的工作组，在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群众中抓大大小小的蒯大富式的反革命，这种错误是共产党在57年反右斗争中所犯的某种错误的继续。这个问题的是非虽大，应该辩论清楚。但这不只是王光美和刘少奇的问题，应该说是中央的问题，甚至包括周恩来、毛泽东都有份的问题。所以，当时我认为对王光美工作组整群众的错误批判应该从严，甚至借此机会让刘少奇这个接班人的地位变一变也不是不合理。但是如果上纲说这个问题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敌我斗争则恐怕有点勉强。

应该说，由于我从小心灵里就埋下了外婆的“造反有理论”的种子，因此我在感情上压根儿对当官的一见老百姓对他的当官资格发生怀疑，就把老百姓打成反革命很反感；同时，对一面高喊为人民服务，一面又千方百计让人民当他的驯服工具的理论更反感。所以，我批判王光美工作组在清华大学整群众的错误是不手软的，因此我当时已经是名符其实的造反派。1966年8月22日清华园批判王光美最严厉的大字报就是我和我的一位朋友一起署名贴的。这篇大字报的题目叫做《有人在与毛主席唱对台戏》，内容是讲王光美的桃园“四清”经验把斗争矛头对准群众和基层干部是错误的，是与毛主席关于“四清”的“二十三条”的精神相悖；而王光美在清华整群众就是继续在桃园搞“四清”时所犯的错误，是故意与毛主席关于“四清”的“二十三条”唱对台戏。由于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夫人，所以读者即便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也不难判断我的这张大字报当时在政治上的冒尖程度。但是，纵然在政治上批判到如此的深度，我当时内心也不认为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矛盾是敌我性质的矛盾。

1966年8月24日以刘涛等高干子弟为首的当时清华唯一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与北京市老牌的中学红卫兵一起联合进行文革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所谓的“革命暴力行动”。那天下午，突然间用皮鞭、棍棒、口号和“语录歌”武装起来的大批红卫兵，以集团军的形式浩浩荡荡从校外开进清华园，以暴力冲击清华大字报区，用皮鞭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在对清华重要的大字报进行拍照之后撕光整个清华的所有的大字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广大师生员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宏大的暴力斗争阵势，因此整个清华乃至整个北京高校区都笼罩着浓重的政治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不得不使我完全接受文革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6年8月24日这个时间，造反派还处在一盘散沙状态，没有形成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蒯大富在舆论上还是被工作组定性的反革命。因此，清华大学红卫兵1966年8月24日的暴力行动事件在文革发展中意义深刻。因为这个事件事实上是以清华大学红卫兵为代表的真正的保守派，给后来造反派在上一堂深刻而生动的政治课：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因此光有理论不行，还得有组织和暴力为后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组织和暴力比理论更重要。因此，很多研究文革的文章认为文革中武斗的悲剧完全是造反派的罪过，我认为这种说法至少在武斗问题上没有真正把握住文革历史的真谛。

此外，唐少杰的文章里说清华大学的师生在文革中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另一派是以《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章中所述的理论思想为代表的“四派”。同时，唐少杰还认为“团派”与“四派”的分歧和冲突也是文革群众运动中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的典型案列。我认为唐少杰的上述看法虽然大体上是对的，但有一个细节还需要讲清楚，否则会影响人们把握文革的实质

，那就是所谓“四派”是“保守派”的说法。因为在我心目中“四派”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极左派，甚至不是一般的造反派，而是真正地在理论上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的，为了解放全人类而造反的造反派。这一点从我批判王光美错误的行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认为王光美整群众无理，而群众造王光美反有理，其中的逻辑是与我幼年时承认共产党造蒋介石的反有理的逻辑是完全相同的。有人或许不能接受把共产党人与蒋介石相比，其实1927年镇压共产党前的蒋介石至少在外表上同样不是黑的而是红的。所以，当时我就认为任何人只要镇压老百姓，不管他以前多红，他那时就是黑的；他若不向老百姓认罪并将功补过，那么红的也完全可以变黑。这种逻辑也是我后来反极左派和极左思潮的逻辑。

#### （四）

历史的时钟指到1967年下半年，应该说当时文革已经在政治上获得了“大翻个儿”的成果，然而文革如同脱缰之野马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狂奔不止，根本无法收场。在这种局面下，中央文革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有插手军队之可能，震动全国的武汉军区“陈再道事件”就是一个预兆。当时，我认为如果中央文革一旦插手军队，中国前途恐怕就更难设想了。出于这种重大的担忧，我写了《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大字报，从而公开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反对极左思潮。应该说我当时虽然在感情上没有任何反对毛泽东的倾向，但认为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支持已经过火了，因此觉得毛需要听一听红卫兵小将逆耳的建议。研究文革的人很容易找到《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文本，当然这要感谢蒯大富的全国闻名的《井冈山》小报对它的大张旗鼓的批斗。《四一四思潮必胜》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全国范围的两派之争代表着两种社会势力的两种政治倾向，也代表着两种文革前途；第二、极左派企图插手军队暴露了极左派的野心，同时更说明了极左派只能利用不可依靠，现在已经到收拾极左派的时候了；第三、依靠极左派无论如何是无法达到文革发动时所提出的防修反修目标的，真正要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唯一的出路只能全心全意地依靠“四一四派”。

结果《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大字报的威力，比我当时预料的要大得多，从有关的种种史料看，这篇大字报对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对四人帮，对很多身在中央或了解中央斗争的老干部们，甚至对全国的红卫兵两派，都或多或少有点影响。但我作为清华园内的一个红卫兵当时是不可能知道相关的全局的。相反我觉得《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出笼对毛泽东的政策毫无影响。于是我决定冒死对毛泽东进行强谏，这就是1967年10月我的所谓的“炮打陈伯达”大字报的出笼。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陈伯达根本不了解，我攻击陈伯达纯粹是因为他是当时的中央文革组长。我知道江青是“炮打”不得的，这叫投鼠忌器。林彪是个军人，当时我对他的历史作用还没有底数。如果“炮打”张春桥之类的人物肯定没有全局意义，所以我只能“炮打”陈伯达，让这位老秀才受点罪了。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另一个目的是把整个“四派”的历史使命在组织上明确化，从而充分发挥清华“四派”反极左的历史作用。

实际上清华“四派”在文革中只做了四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是与蒯大富的“团派”的组织上决裂，使中央文革计划中的清华大学以蒯大富的“团派”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政权泡汤，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地限制了蒯大富这个中央文革的铁拳头的作用的发挥；第二是出《四一四思潮必胜》，使全国的反极左力量或多或少有一种统一的理论思想来指导自己反极左的行动；第三是公开尝试反中央文革之可能，从而明确“四派”反的组织矛头所向；第四是以暴力回应蒯大富的暴力，坚持清华武斗，逼迫毛泽东作出某种选择。

到今天我实事求是的讲，文革后来之所以如脱缰之野马一直收不住，一方面是当时中央文革为首的极左势力的极左政策之必然；另一方面是因为多数的群众，不



接受当时事实上的大翻个儿的文革政治局面，所以任何人企图快速收住文革运动的步伐是不可能的。具体到清华大学，只要蒯大富的“团派”掌权，我们“四派”哪怕血战到底也不会让文革就此收场，任何中央首长来作任何相反要求的表态也都白搭。由此可见，领袖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能动范围是有限的。

同时，在历史的大潮之中，群众虽然原则上无法选择自己所在的历史环境，但群众总体上也不是英雄人物任意运动的一群阿斗，群众能够而且也必然会在其所在的环境中显示其应该显示的作用，所以千千万万群众的意志行动起来必然会显示出社会利益的总格局，因此自然也会辩证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我个人的参加文革的思想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出身不好的大学生，与很多出身不好的人一样，参加一方面出于革命激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不过我幼年时的遭遇和外婆给我的教育，从根底上决定了我只能站在蒯大富的“团派”的对立面。由于我出身不好，我名义上只能是“四派”二十多名委员之一，但实际上我在“四派”中领导着全派反极左的铁杆队伍。历史证明这支队伍是富有献身精神的文武双全的一族，由于这一族的支持，我才能在“四派”所做的四件大事中的前三件里，起到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我现在遗憾的是无缘与我的文革一族一起参加清华“四派”可歌可泣的武斗，因为当时我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监狱。

所以我认为：历史是英雄史与群众史的对立统一；历史是英雄与群众共同创造的统一的历史。英雄创造历史的特色是其正反方向奏效都快，统领和综合效应大；群众创造历史的特色是正反方向奏效都慢，但辩证地显示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的能力很强。长期以来人们偏重于英雄史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了群众史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地位还不可能处于主导地位。对英雄来说，能够发现和顺应群众所显示出来的历史发展方向，是其创造成功的英雄史的关键。总之，否认或夸大占据历史战略要地的英雄创造历史的作用不正确，同样否认或夸大处于历史的基础地位的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

## （五）

1967年10月我因为反中央文革而坐牢。这次坐牢是我人生第一次坐牢，再加上审讯的目的无非是强迫我承认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其实如果我真反的话也不怕承认，问题是当时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确是很忠诚的，甚至在我看来像我这样忠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人在中央也不多。所以我在这次坐牢前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是一旦事情真正发生，对自己的精神打击还是很大的，尤其当审讯与我的出身联系起来时，我心中的冤屈和苦痛确实是常人难以设想的。

这次坐牢时间不长，大约不到一年时间。我在牢里对文革的理论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当时的结论有四条：

第一，当时我是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情和动机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逻辑上，必然导致尝试用文革大民主来调整干部群众关系，实现大同目标，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第二，文革揭露出来的问题说明，共产党总体上的问题是精神特权太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对共产党始终是个大问题。同时，这种精神特权在上层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化为物质上的腐败。

第三，文革的确是中央换班子的工具，我认为这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历史证明，上层的激烈的斗争不见得对老百姓有害。

第四，我认为用大民主的办法来防修反修是有问题的，首先大民主本身是有大前提的，它是以毛泽东手里的军权和理论威望作后盾的，一旦没有这个大前提，大民主就只能导致清华大学1966年8月24日的大暴力；更重要的是大民主与大暴力之间震荡幅度很大，中间又没有具体标准，所以大民主实际上随意性很大，很难具体地用来防修反修。

所以，我这次坐牢虽然身体上也损失很大，但主要是精神上受的打击很大，因为我不但看不到人民和国家的希望，也看不到我所信仰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任何前途，更看不到自己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一片忠诚能结出什么好果子来。因此，这次坐牢的确是我人生最苦的一劫。

1968年7月，据说因为蒯大富向进驻清华大学的工人宣传队开枪而犯了错误，中央没有处分他，但为了政治上进行平衡，毛泽东亲自讲话对我从轻发落，即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年10月，我被释放返校，当即我又被送去沙城4648部队劳改，到1970年底我作为犯错误的六九届毕业生分配到邯郸地区成安县农机厂当技术员。如果没有文革，我读完六年清华大学，应该在六六年走上工作岗位了。

## （六）

在我们国家的最基层——县城农村，我继续通过实际生活来反思文革。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我发现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和组织机制与经济建设是相悖的。从基层看得很清楚，干部抓生产原则上都是外行领导内行，不但没有科学可言，而且不是浮夸就是腐败。干部只从意识形态方面向党内的上级负责，因此手中的生产管理权力没有任何实在的约束，很容易转化为特权，或者是在物质上大搞特殊化，或者是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和迫害群众。据我了解，在当时的地方的基层中，不少干部比小说里所描述的解放前的土豪恶霸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反，好干部要为老百姓办好事或不搞特殊化反而很难，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寸步难行。这种严酷的现实使我非常痛苦，我在成安的十多年中经常想，历史的发展趋势似乎在证明蒯大富对共产党的总估计是正确的，而我们“四派”似乎估计得过份乐观。看来基层的实际情况证明，对共产党来说要不变质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老百姓不断造反，不断搞大翻个儿，即不断地改朝换代，否则共产党要不变是难上加难。

1977年，我在报上见到讨论资产阶级在哪里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党内有的人就是不接受文革的教训，动不动就把资产阶级这个敌人描述在党外，以便他们去镇压反特权的老百姓。然而，我认为实际生活已经证明资产阶级确实像毛泽东讲的就在于共产党内，上面越喊抓生产，老百姓按生产指标就干得越多越苦，而干部就越容易无法无天。所以，当时我对邓小平的一套不感兴趣，因为我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的总框架中，还看不出老邓搞整顿抓生产的一套能给人民和国家带来多大的希望。相反我越来越确认毛泽东临终时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大胆提法是真理，认为这至少是老百姓对付贪官恶吏的一个阶级斗争的好法宝。所以，我一见《人民日报》关于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外的文章就火冒三丈，不管三七二十一再度上北京贴大字报批判《人民日报》有关的文章。我当时的大字报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中央不管干部的腐败问题很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文革的大民主根本没有过时。当然，这种做法主观上也是要求注意我，为我的文革问题翻案。这件事刚好赶上西单墙事件，华国锋上台执政下令整压贴大字报的群众，结果我又第二次进了北京市的监狱。这次坐牢时间比我在六七年第一次坐牢长两倍，一共坐了三十个月，虽然在身体方面受损不小，但在精神方面远不像第一次坐牢那么沉重。相反这次坐牢使我的知识和阅历两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长进，别的不说光讲在理论上，我在牢里终于读通了《资本论》，从而对文革的思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读通《资本论》是从辩证法方向读通的，我发现依据辩证法，阶级矛盾必须成对消亡，而且阶级矛盾的生死大权不掌握在阶级矛盾任何一方手里，而在社会生产力的手里，所以企图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办法来消灭阶级，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只是无产阶级适应马克思时代的历史环境的应变策略理论，而不是人类求解放的战略性理论。同时，我也明确地意识到，干部问题首先不应该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首先应该是个体制问题，因此干部问题实际上综合说明了社会生产关系是否能够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问题。这样，我终于在理论上真正搞清楚了文革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同时我对文革中红卫兵提出的所谓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开始有了我自己的独立思考。

总之，这次坐牢，我虽然身在牢笼之中，但我的心已经冲破了牢笼的束缚，开始自由地飞翔。

1979年底，北京市公安局不知道什么原因决定释放我。释放的结论是：以反革命罪逮捕周泉纓是不对的，但周泉纓来京贴大字报干扰了揭批四人帮的大方向，所以拘留周泉纓是正确的。后来有关方面向我解释，说我是在思想上犯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所谓“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泽东生前作过的批示和说过的话，毛泽东死后仍然要坚决执行。我对上述结论的答词概要地讲有三点：第一，北京市公安局犯的毛病，即一见群众的不同意见就镇压的毛病，本身是四人帮的毛病，很危险；第二，我是人民的儿子，人民有人民的判断标准，人民不存在什么“凡是”的问题；第三，我仍然坚持认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外这个提法对中国来说，远不如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这个提法更合理。

## （七）

改革开放之后，我经常在深思，如果没有文革的话，中国社会将会如何呢？世界格局又会如何呢？我认为任何人都不难判断，如果没有文革，甚至如果毛泽东在文革前已经去世，那么中国很可能就是现在的北朝鲜，世界将继续是两极冷战的战场。六四后的苏联解体和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至少要推迟几十年才能出现。当然，江泽民讲的全球的共同发展的理论，至少今天是无法付之实践的。

黑格尔讲过，凡是存在的东西一定是合理的东西，所以反过来讲凡是灭亡的东西一定是不合理的东西。文革之所以震动了全球，说明文革有震动全球的合理性。文革失败之后，中国改革开放之举又震动了全球，这又说明了文革有震动全球的不合理性。因此，从哲学上讲，文革作为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环，必然是历史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对立统一过程，它决非纯人为之举，或者说它只能是以人为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历史之必然。

出于上述哲学上的考虑，我在改革开放中，结合自己在文革中的体会和对自己国家实际情况的了解，继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锲而不舍的研究，最后终于对文革有了明确而自信的理论认识：

第一，文革提出的问题不是共产党的新发现，而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已经明确地提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解放全人类与解放自己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人类如何实现大同梦的问题。从哲学上说，人类的大同梦是宇宙普遍联系法则（宇宙大统一法则）在社会问题上的时代现形态，因此人类大同梦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具体形态，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主导社会发展。这也是文革发动时期，文革政治能够伴随着“造反有理”和“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口号声迅速席卷全中华的原因。

第二，马克思为了圆人类大同梦设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毛泽东一代

手里主要有两个法宝，一个叫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叫计划经济，前者管上层建筑，后者管经济基础，它们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的理论体系。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法宝灵不灵，其检验标准从战略上说当然是它们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效果如何，但是最直接的检验标准是这两大法宝调整社会干群关系的功能如何，因为所谓干群矛盾实际上是我们国家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两方面社会矛盾的综合点。关于这一点，理论上和权力上都很敏感的毛泽东，在文革之前早已经察觉出来了。他决意想试一试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法宝对调整干群关系到底灵不灵。显然这种试验无论从权力出发，还是从理论出发，目标是统一的，但理论方面无疑是实质性的，尤其在理论问题全面地展现在人民面前时更是如此。

第四，文革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合理性与其不合理性相比，无疑还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点不但从文革两派之争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从全国的政治局势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应该说在1967年秋季，文革在政治上实际已经形成大翻个儿的局面，而且这种局面还有毛泽东手中强大的军权和理论权威支撑着，但老百姓就是不买账，最后像清华大学那样直至开枪见血杀红眼也还是不买账。原因就是老百姓从实际和理论两个方面都看不到文革的结局比文革前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另一方面，文革发动极快，并且全国长期处于大乱之中而不崩溃，更说明共产党当时还是很有生机的，最令世界上所有的执政者惊讶的是庞大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震荡或甚至不满，始终围绕着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权威在旋转，整个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出现任何能与共产党相抗衡的政治力量。

第五，事实证明，严重的问题不是像很多官方的文革评论家所讲的那样，文革形成的灾难似乎不可收拾；严重的问题是文革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方面，全面暴露了马克思的两大法宝不但不能在现代帮助中国老百姓去圆世界大同之梦，而且显示出中国正在走下坡路的必然大趋势。文革中依靠大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培养和扶植起来的新干部阶层，比依靠枪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战场上筛选出来的老干部阶层，在抗拒特殊化和吸收代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力量等方面的能力都大为减弱，相反在搞阶级斗争恶性内耗方面的能力则反而增强。而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在体制上根本找不出自我调整可能性。

第六，同时，中国社会上述这种大趋势，在哲学上又能找到无可辩驳的依据，有关的理论推导，简要地说是这样的：所谓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或专政来消灭阶级关系的设想，所谓依靠人类的智慧完全计划人类的生产和需求，这两种设想都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宇宙和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世界上任何矛盾关系和任何物质系统，包括人类社会在内，它们的生死大权从来就不掌握在它们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宇宙大环境手中。这意味着在任何系统内通过自我调整内在结构去适应环境的变化能力是有限的，这种自我调整能力的限度一旦暴露出来，就意味着这种系统已经行将灭亡。

第七，既然法宝是不灵的，那么施展不灵的法宝，其结果只能是更快更彻底地暴露法宝自己无法克服的绝症。而在这个问题上，历史显示了不让民族安于文革前的现状的毛泽东的伟大。换言之，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在客观上对民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我认为，对于一个大民族而言，要称得上伟大民族，先决条件是要对人类进步有贡献，而决不是拖人类进步的后腿。所以，当马克思主义的法宝的历史的不合理性开始暴露出来的时候，坚持对人类的大同梦的追求，及时地去找民族的历史的出路，本身是对民族进步的伟大贡献。相反，如果让在“枪杆子里出政权”过程中获得的民族安居现状，那么对中华民族无疑等于要重犯清朝康熙时代的闭关求安的历史性大错误。所以，我们后人应该注意从历史的辩证的反方向去把握历史真谛，我们必须问一问我们的民族，如果中国没有文革的话，中国能有今天的局面吗？

所以，我认为文革发动的成功，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大地上贯彻到底之必然；而文革的失败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违背历史规律之必然；文革的伟大的功绩在于它以极高的历史的加速度使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换言之，文革是一种历史的疯狂，它以疯狂的高速度结束了七十年来人类的乌托邦大实验。至于为什么文革这种历史的疯狂，会落在中国身上而没有落在苏联身上呢？根本原因是中华民族近一百多年来受压迫受苦太甚，因此思变思强求世界大同的思想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顽强共识。在文革和改革开放中，这种民族的共识始终在起重要的作用。当然，从哲学上讲，这也是宇宙联系法则，即宇宙大统一在人类社会问题上的体现。

## （八）

研究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历史这个东西，当代人往往很难看清楚它的真面目，而且越是大的失败的历史，越不容易看清楚它的真面目，文革就属此列。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大失败的历史涉及人们的伤痛太大，因此有关观念的时代局限性也大，这就使历史作为人类共同发展的过程或脉络往往演绎不清楚，而人类恰恰又只能通过历史过程才能认识清楚历史。但是，如果人的哲学根底强的话，对于文革这样的大失败的历史，也是或多或少能先人之见而见的，虽然这种先人之见而见的超前程度是有限的。

既然，人类只能从历史过程去认识历史，离开了过程，便无法认识历史。因此，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思路扩大一些，把文革问题放到世界现代历史中去考察，把文革问题与今天世界所面临的知识经济问题一起去研究。若能如此，我们会发现文革事实上已经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文章做绝了、做完了。所以，文革的失败等于向全世界执政的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公有制经济社会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存在的理由到底应该是什么？对此问题俄国的回答是采取西方的老办法，这种方式看上去很右，实际上则很左。从理论上讲，它是在所有制大变革的阶级斗争老框框中搞大翻个儿，即在与十月革命的相反的方向上做阶级斗争的老文章。当然，对这一点在俄国的当事者是看不清楚的。而中国改革的办法看上去相当左，实际上并不左，它企图跳出所有制大变革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老框框，走出一条新路子来，即努力避免在所有制问题搞大翻个儿，而是走所谓公有制的变形之路。当然，中国的当事者也不一定完全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所走之路，在理论上的深层内涵到底是什么。他们只是受自身的利益所驱动罢了，但其自身利益的范围涉及越大，其行为显示的规律的作用也越大。总之，中俄改革都结束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体制，并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两国改革的不同之处是在所有制的变革的方式上，苏联的做法实际上从反面极其重视所有制问题，中国的做法相对来说是从正面不那么重视所有制问题。这两种做法反映到生产力上来意味着什么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现代生产力由三个要素组成，它们是科技要素、资金要素和劳动要素。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科技要素即将取代资金要素的领导地位而成为新的领导要素。这个事实世人都已经不再怀疑，只不过认为要实现这一点有一个时间总是罢了。但是世人可曾想过生产力三要素中领导要素的更换，对社会阶级关系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现在还无法具体地预料将来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具体形态，但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论，能够断言崭新的比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对阶级关系更先进的阶级关系正在世界上形成，这种崭新的阶级关系就是未来的知识经济社会的主要的阶级关系。

于是，我们将中俄两种改革的不同做法与上述世界阶级关系大变动的大趋势进行对照，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办法本质上将资金要素的领导地位客观上淡化了一些，其结果是情不自禁地在向未来科技社会方向演化了一步；而俄国的办法是人为

刻意地在走历史的老路，继续强化资金要素在生产中的领导地位。这两种不同历史的造反所带来的不同的社会效果是多么发人深思呀。

最后，我们基于上述分析，再在把知识经济社会行将来临的历史大趋势与我们国家失败的文革联系起来，并将它们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来看待，那么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也就更清楚地显露出来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向大同社会冲刺的伟大的尝试，是类似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大事件，它标志着长达百年以上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对阶级关系主宰世界的历史的结束，它预示了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所以，文革的失败是必然的，但也是加速历史发展所必需的。中国人民为文革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中华民族在文革中显示出来的百折不挠地追求人类大同的伟大精神，是人类加速自己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种精神将在人类历史上永放光芒！

书于一九九九年元月十八日之广州

（电话：020-83809078  
地址：510060，广州市华乐路43号703室）  
~~~~~

【研究报告】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六）

• 宋永毅 • 孙大进 •

第八章 清华四 • 一四思潮：河归旧道十七年（续）

和周泉纓谈话纪要（摘要）

〔原文按语：在周泉纓同志被一些声称“群众”的人扭送到市公安局去以前，我们和他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座谈，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已于十月十九日下午将详细记录如实整理成座谈纪要。因为文章很长（近一百张大字报），从今日起我们将分批陆续发表。〕

鉴于清华某些人不能对事物一分为二，不分析研究，只凭看文章作者的姓名，就对文章采取绝对化的态度。不讲道理，武断撕去大字报，鉴于某些同志对“毒草”只采取“封锁”的手法，不让人家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毒草”，以肃清其毒性，而是简单地对大字报采取“一撕了之”的不恰当手法。我们特此郑重声明，不允许任何人武断地把大字报撕掉。

如果有人撕大字报，只要他不怕真理，只要他讲道理，那么必须在“撕”之前，与我们充分辩论，只要他说的话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自己也会采取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动。

任何人，如果他胆敢无理撕大字报，那么由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策划者全部承担，包括必须无条件接受我们惩罚他的一切合理要求。〕

◇ 一．文化革命的意义

问：有材料揭发你收集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你到底对大革命怎么看呢？

周：同志们对我说过的一些错话，做过的一些错事加以揭发批评，这是好事，是对

我的爱护，革命小将尽革人家的命，也要允许人家革自己的命。过去，我在四一四里尽当“秦始皇”，不当老百姓，逼着同志们按我的想法办事很不民主。这回大家反过来，批评我一下。这很好嘛！特别是三七战团的同志对我的弱点批评的最淋漓尽致，我应当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脸色还比较诚恳）至于收集阴暗面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每个紧要关头慌了手脚，失去信心的人是不少的。有人动不动就要上山打游击去，我可没有嚷嚷要上山打游击吧？每当东方红战团中有的同志谈阴暗面多一点的时候，我总是说：“眼睛不要光看到鼻子尖儿，世界上的大事不要急嘛。有毛主席在，有林彪同志的一支军队在，你慌什么？”按我看，在每个关键时刻我估计形势在清华还算得上是个“乐天派”！当然战略上估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战术上我和其他同志一样是谨慎的，按习惯语说法是：“决不让老保翻天，也不让极‘左’翻船。”战略的信念是落实在战术运用上的，两者是对立着的统一，不是一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问题，是很大，很深，很长的问题，我按我的理解谈一点看法。有的是在东方红战团常聊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严格地说是无产阶级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用自己的政权反对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改造上层建筑，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

历史上一切旧的社会制度向新的社会制度转变都必须有个相当长的过程。现在毛主席的理论把过程总结出来了，分为二步。

第一步：是先进阶级用暴力从没落阶级手中夺取政权。

第二步：是先进阶级手中的权发挥伟大的神威，反对旧的阶级利用余留下来的旧的上层建筑演变和颠覆新政权。复辟旧经济基础。坚决地变革经济制度；坚决地打烂旧的上层建筑，建立新的上层建筑来适应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完成了上述两步，新的制度就完全代替了旧制度了。第二步比第一步艰苦得多，长期得多。因为上层建筑的东西，人的精神的东西，不象制度那么好变革，它很顽强，能量很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旧的上层建筑完全可能反作用过来，把新的政权颠覆掉，复辟旧制度，这是历史车轮的倒转。不要太幼稚，暂时的倒转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在整个转变时期内紧紧围绕政权问题，复辟与反复辟就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所谓新政权神威首先是用来反对反动阶级复辟的神威。

历史上，每个制度的大转变过程中，都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的问题。欧洲、法国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复辟过。我国古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变过程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我国的历史很怪，奴隶社会只有六、七百年，而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则花了近千年的时间。这是什么道理，很值得研究。周朝依靠奴隶革命推倒了殷朝，建立了周朝，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皇朝。以后这个皇朝发挥新政权的巨大威力，变革奴隶制度，使之向封建制度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奴隶主是顽强地搞复辟的，舆论在前，暴力紧跟。（翻小本子）小的不说，最大的所谓“管蔡武庚”的武装暴乱就是一个典型。奴隶主进行复辟的形式是利用自己在周朝政权中的地位来进行复辟。这似乎和现代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有点类似之处，当然新政权要反复辟。首先是军事镇压，然后在打击一小撮的同时，用软的一手，即用金钱，物质刺激，名利等拉拢大部份，强迫奴隶制的瓦解。强迫相应的上层建筑转变。

由此可见，我们主席亲自发动和统帅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主席天才地全面地总结了社会制度发生根本转变的过程中先进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继续在政权问题上与没落阶级展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的历史规律。从而破天荒地建立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进行反复辟革命的伟大理论，为

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并且进行着伟大的实践。关于这个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报纸上，文件上讲的很多，我就不再重复了。

◇ 二．成绩的衡量法

问：意义谈了，成绩如何估计呢？逍遥派为什么这么多呢？

周：一个伟大的政治事件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意义，伟大的政治事件的意义往往是很难估计的。用物质、用钱、用死人、用眼前利益是没法估计计算的。时间上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范围不是几千里江河的问题，有时候是上百年或千年的发生作用。这给历史家带来难题，他们往往因为自己境界低，眼光短浅而挨后人的臭骂。

问：有实例吗？

周：有的，而且很多，例如，秦始皇这个人物是人人皆知的。但是我看很多关于秦的评论中，似乎很少有比较合理的。秦皇朝兴有十年时间，十年很短吧！历史一刹那时间。可是这个封建皇帝，在这个十年中，为最后向封建制度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度统一的封建政权机构。建立了一整套统一的制度。中国在秦以后的近两千年的封建朝代中的帝王将相，基本上是在秦基础上运动。光说筑万里长城一事死了很多，但是长城以后各代中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救的人，得到的东西比失去的大得多呀！长城是人民造的，但秦始皇的组织是不可抹杀的，尽管这位封建皇帝最后因为残暴的阶级本性和操之过急而垮台了，但是他比起镇压农民战争起家的刘邦、李渊、李世民来说是有贡献的。秦始皇十年中巡视全国多次，要知道当时只有马车！亲阅各种重要文件，我看这位天子，在封建皇帝里是够雄才大胆的了。

可是很多历史学家，不会评论农民运动，连秦始皇也评论不了，他们往往把秦始皇骂得比其他皇帝都坏，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对农民的软刀子和硬刀子没有太大差别，都应该批判，而且软的更该批判，因为他迷惑人，问题是对历史的贡献和政治事件的长远意义，有客观的评价罢了。

封建时代的政治事件的成绩，意义是如此深远广大，何况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伟大人民革命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了伟大的革命，搞掉了政权机构中如此大的叛徒集团，发动倾国人民来搞理论批判，触动着几千年剥削阶级的根基，这种魄力是有史以来没有的，人民直接掌握伟大理论的时代开始了。

革命象核聚变一样在七亿人民灵魂中产生巨大精神力量。它不仅现在震动了世界，而且将对世界的未来起巨大的作用。精神的力量化为物质力量，要有时间，有空间，有人们的实践。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威力，已经在中国、在世界表现出一些来了，将来精神核能放出来的时候，就不得了了。这种能量也可能是要放很多年，很多年，可以预料，用我这点境界去评论世界上第一次广度、深度最大的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不够的。

当然，世界上不可能有不付出代价的成绩，也不可能有不犯错误的革命事业，问题是什么阶级什么革命家用什么立场来衡量这些事业，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上则是最有气魄，最有远见，只有他们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看待革命成绩的伟大意义，主席就是典范。当然有魄力、有远见、敢于付出眼前的一切代

价，去换取伟大的成果，并不等于战术上对敌人的麻痹，要知道，每当革命大风暴快要取得成果的时候，敌人总是企图夺取成果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翻船的问题，要记着历史上无数次伟大的农民运动成果丧失的教训。这种气魄、远见，是辩证统一的，这是对革命人民高度负责，主席就是这样做的。对于我们，世界革命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一旦颠覆，世界历史车轮将会迅速倒转，这可不是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有志气的中国青年，必须学习毛主席，现在毛主席提出一系列最新指示，全国局势已定，决定了成果的取得，至于一些具体问题是慢慢解决的。

比如你们说的逍遥派是容易解决的。

第一，要看好的一面。

我进清华七年了，没有象现在这样浓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空气。现在许多人都在看毛选，看马、恩、列、斯著作。人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解放，当然这些学习当中有些是“失败者”“战胜者的军队最善于学习”，这个我深有体会。一年多来，在大风大浪中游泳，许多人都喝了不少水，吃了败仗。现在，战胜者在更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极好的现象，这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具体表现。

第二，要具体分析。

逍遥派中一些人是一直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古今中外的一些文件书籍的，他们在这里下的功夫很大，他们不仅这样深入细致的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我是很尊重他们的，他们是“小人物”，似乎是默默无闻的，对小人物不要蔑视，对大人物不要迷信，这是我一贯法则。须知在很多问题上，“小人物”往往比大人物更容易理解和应用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何等深刻呀！毛主席有句话：“事情是小人物作起来的，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后面记不起来了，这句话很英明，充满了辩证法。这些人中，有许多是文化革命中的先进分子，有的是“战败者”，当然，也难免有一些“悲观论”者，研究角度不一致，态度不一致，但是我相信，在毛泽东思想光辉下，在大革命威力逐步发挥的状况下，这些人中，必定会有不少人将来很有创造，他们是很有希望的，当然也必定有一些人走向反面，被无情的历史所淘汰。

还有一些吃喝玩乐的逍遥派，这是少数。只要组织。引导可以不逍遥吗！

第三，要允许不平衡，不要慌，十个指头不一样长，七亿人相貌也不一样，不平衡是绝对的，大家认识不一致，很多人在某个问题上一时跟不上来，水平不同，不断的用毛泽东思想去统一嘛！在一定时间，一定的问题上，多数人总是可以统一的嘛！统一之后又会不统一，在不统一面前不要慌，逍遥派在斗私批修这个伟大方针指导下，总有一天会组织起来的。联合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历史上每一个大突变后，都需要一个相当的稳定期来搞平衡，这是规律。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反右，不是一个个过来了吗？再大吗？世界大战不是也过来了吗？世界上一切事情都不要慌。“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嘛！刚才念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到这儿就很说明问题。

还有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儿的“和平”都首先是以不和平的暴力和政权来保证的。

然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把“妥协”搞成目的，搞成主要的、唯一的手段，放弃武装斗争，搞投降，把权拱手交给阶级敌人。印尼就是这样的，遭到了巨大的挫

折，法共对资产阶级妥协、妥协、一再妥协，卖掉了灵魂，完蛋了。

中国人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要对世界的伟大转变作出伟大的贡献，人多应该贡献大，这是应该的。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我们要有苦干一辈子，紧张一辈子的精神，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改造自己，习惯于紧张、艰苦的斗争。必要的修整为更猛烈的斗争，不是逍遥，要永远使人民的锐气尖尖的，活力雄雄的，斗志高高的。平静安逸对全世界革命人民没有好处。

◇ 三．修整、巩固、妥协是必要的

问：大革命具体怎么收法？

周：先谈谈为什么要收吧。

问：这不很清楚嘛，也很简单。

周：你说说吧。（等片刻）怎么不说了呢？我替你说，你给我补充。事情的过程必须是波浪形的，有高潮、有低潮，有峰、有谷。一浪接一浪向前推进。高潮、顶峰指的是平衡的突破，是前进的标志。但不能老向前进啊，人跑累了要休息一会再跑，机器运动长了要冷一冷，维修一下，于是出现了低潮、谷底。这是旧的平衡突破以后，为了达到新的平衡的必要阶段，是迎接新高潮的到来，不是浪费，这是规律，不以你的主观愿望变化的。人跑长了要昏倒的，发动机开长了要拉缸、断裂。到这种局面时被动了，再来修整补充，就已经违背规律了，修整的时间反而长，反而费劲，结果想快反而慢，想直反而曲，“以迂为真”是孙子兵法一术语，这术语大概也有这种意思。

一场大革命往往是被根本改变社会制度打开了局面，从根基上动摇了旧社会制度，但完全把旧制度变成新制度，并不是简单的叫几声“彻底砸烂”就万事大吉，完全彻底地完成转变，要很长时间，要在革命大风暴后的很长时间里完成这个转变是一个很长、很艰巨的任务。完成这个转变，有条件、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其中包括了群众觉悟、革命力量在一定时期内还有轻重缓急主次的问题，它可能还不是最重要最紧急最主要，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修整、巩固、妥协”是必要的，这种时期有时需要相当长，我相信人的能动性的发挥能够加速完成这种转变，使历史更快地前进。但是人决不能改变革命斗争长期性这一客观规律。特别是“国际性地转变到共产主义”这样一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更不是人们所能改变的。我们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同时争取尽可能的加快完成这个伟大的转变。

“修整、巩固、妥协”这种词似乎是没有光彩的，其实不然，这是在大革命大变动后的巩固阶段的很必要的手段，其效果是巩固大变动中获得的成果，修整大变动的损耗，总结经验，积聚力量以便第二个高潮更快到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对敌人来说，上述措施能够更好地分化他们，使我们矛头更集中，歼灭战打得更彻底，很多矛盾解决得更符合发展要求、更辩证。此外，及时必要的修整、巩固在某些场合可以防止外来的突然冲击，或有准备应付这种冲击。比如战争中，某些时候能防止敌人翻我们的船，使他们失机，等等。

关于这些，实例很多。封建皇朝统治者有的很狡猾，很善于妥协，结果往往一个朝代要垮台，又搞得中朝复兴或朝代延长，周朝、汉朝都有过中兴时期。各个朝代前几个皇帝都很懂得用一些妥协来修整民力，补充战争的损耗，以便瓦解农民武装力量，维护封建统治。唐太宗、刘邦可算是他们当中最高明的了。相反，秦始皇处在封建制度刚刚完善时期，他残暴过急而不懂得修整、妥协，十年就跨了，这是封建时代。现代也同样，当然事业的本质是不同的。列宁时代有过很多妥协的措施

，有的很成功，是很必要的。例如，在1928年和德国订了一个条约，妥协了推进一步为的是进两步，因为年轻的苏联实在需要修整啊！否则很容易死亡，当时布哈林这混蛋反对，好“左”啊！但是“左”的结果是要翻船的。我们毛主席的伟大政策也有“退一步进两步”的妥协。比如给定息，可以作为孤立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补充手段！政治上孤立敌人，瓦解敌人，改造他们，而我们的代价可以少些这里钱是次要的，很合乎我国国情，合作化后要整社，自留地保留一段有好处，大跃进后要巩固、调整、充实、提高，不能一直前进，破坏必要的比例关系，困难年间要注意人民团结。

文化大革命后期，“修整、巩固、妥协”的政策也是要采用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成果，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军队问题首先是一个防止翻船，巩固成果，保证胜利的问题。军队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是有的。军队是在社会中的军队，社会的阶级斗争势必要反映到军队内来，关键问题是如何估计这些问题。要不要搞？肯定要搞。关键是如何搞法，何时搞？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如何？“揪军内一小撮”、冲军区，似乎很革命、很彻底，但是须知用这种方法搞军队，估计错误且不说，主要的是在现在的条件下，这样搞是要自毁长城，军权要丧失。

军权是政权之灵，军权一丧失，不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手里。我看外国人不打进来，也被敌人翻了船。当然军权一失掉，帝国主义必然要打进来，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暂时的失败和巨大的挫折是完全可能。不要太幼稚。伟大统帅毛主席坚决反对“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号召“拥军爱民”，这是英明的决策。这个英明的决策粉碎了国内外敌人想翻我们船的阴谋，牢牢地保障最后的胜利。

干部问题，上天安门都是左派吗？我不大信。毛主席说“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嘛！要使用一些犯错误的干部，甚至有一些有过反毛主席错误的大干部，这样做对敌人不利，孤立了敌人，对我们有利，光靠罢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下，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他们嘛！肯定的，干部队伍不可能百分之百纯的。真空抽到了小数点后面几个九，还有百分之零点一或更多的空气呢！宽大一些是一种妥协，一是反面人物还有暴露过程，而犯了错误的干部有个改正过程；二是党内外群众还有个认识过程。斗争是长期的上述两个过程也必然是长期的，违反了长期性的规律，操之过急，扩大打击面，反而对敌人有利，对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好处。

群众认识问题，过急不行，要实践，要有个认识过程。用过急的办法达不到快速的效果。突变和冲击很必要，但不能老突变、老冲击。让人民群众用“团结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通过“斗私批修”来解决，这是一种修正提高。

文化大革命以后要修整，要巩固成绩，要完成很多具体变革，要发展生产，准备战争，要使精神上的成果落实到人民革命实践中去，要总结经验教训，要聚集力量准备世界的转变或者本国更大的革命高潮。主席好象说过要修整十年不知是否是真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来，“妥协”必须以具体条件来定，必须有大前提，即必须用政权和革命暴力来保证。“妥协”是革命的辅助，如果要使之过火，使之过长那就要走向反面。比如全国解放时，攻占北京城，团团围住傅作义交代政策，迫使他缴枪投降。

◇ 四．干部问题

问：干部问题如何看？

周：干部问题和看待十七年问题紧紧相关的先得说清楚如何看十七年的问题。这个问题内容很多，也很大。我再谈谈看这个问题的方法，具体的研究很少。

结合教育制度这个具体问题来谈吧。

教育制度是个上层建筑的东西。中国的教育制度成份复杂，有封建主义的，有殖民地的，有资本主义的，有修正主义的，但总的来看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然首先是搞土改、搞镇反、搞经济恢复，使年轻的红色政权站住脚，才能进一步搞变革经济制度，最后才能逐步地花力量来变革上层建筑，使它适应经济制度的变革，进一步巩固政权，这样旧社会留下来的教育制度变革问题才提到日程上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后，具体如何改？如何变？就有一个逐步的认识，逐步的实践，十七年来在教育变革中，广大干部在毛主席领导下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就是在努力完成这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

有不断实践逐步认识的过程，这一点对任何人都毫不例外，问题是在于对旧教育制度采取什么态度，是彻底革命，彻底砸烂旧教育制度呢？还是进行变革，保留旧教育制度呢？这是两种革命家根本不同的态度。两种态度、两种目的，前者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制度，后者是为了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和制度。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前者的总代表，而刘少奇则是后者的代表，蒋南翔是他们的爪牙，于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一系列的政策问题上就表现出来了。

一个要变革教育制度，使之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个要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一个要培养劳动者，一个要培养所谓的“工程师、专家”。一个要彻底变革，搞半日制、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亦工亦农亦兵，一个则要搞全日制，保留旧制度。

在实践上一个大力提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个则拼命吹捧清华教育质量高，大搞研究院等等。

在斗争中刘少奇的斗争艺术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对主席路线是阳奉阴违，随着毛主席路线的深入贯彻，教育变革也越来越触及本质。与此同时，刘少奇对主席路线的阻力也越来越大，最后发展到最近几年完全公开对抗主席的地步，教育革命进行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只有经过在政权中把刘少奇打下去，夺取他们的教育大权，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样的历史分析，教育制度变革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性的东西。第一，有过程；第二，充满这革和保的斗争；第三，斗争形式是在同一面红旗下进行的，斗争是逐步激化的，并非一下子全面展开的，敌人——刘少奇、蒋南翔有一个充份暴露的过程；第四，尽管近几年来刘少奇的路线，在教育界许多环节上似乎特别猖獗，但是，从十七年再加上大革命总和来看，主席路线在教育革命中是占领导地位，是不断推行革命，不断压倒刘少奇路线的，在这些初步的结论性的东西的基础上再来看干部问题就容易多了。

第一，十七年来毛主席统帅着大部份干部对旧教育制度进行变革，变革是逐步向前的，这就意味着是取得一定成绩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是靠主席思想的伟大作用。但是具体实践主席思想的是千百万好干部和革命群众，所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有贡献的。

第二，两条路线斗争有逐步深入的过程，阶级敌人是处在掌权的地位，他们的斗争艺术是极迷人的，他们嘴脸的暴露也需要有个过程。因此好干部在主观上执行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时候，客观上恰恰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执行的是刘邓路线，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主观与客观分离的观点，是符合认识规律的。

第三，毛泽东思想有个贯彻过程。干部对主席思想的理解、认识也要有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干部头脑中的旧东西，必然也要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主席的东西，这样就在某些时刻某些问题上执行了刘少奇路线，这是他们的主观原因。

由此可见，毛主席关于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结论是完全符合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客观现实的！作为一个犯错误的好干部身上就有两个方面了，一是忠于毛主席，努力执行主席路线的一面，二是受走资派利用和毒害、执行错误路线的一面。前者是主要的，所以我们才称得上好的嘛！这是对于一般好干部的两重性。

而刘少奇则诋毁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把大部份好的、比较好的打了下去，直到今天解放干部的问题还未解决。而这个问题在运动后期非解决不可，否则政权巩固不下来怎么办呢？要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干群关系问题。

干群关系（分析中干部都不包括走资派）严格地说决定于干部的两重性。它分为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相应于干部的错误的一面。一切阶级敌人通过走资派扩大和保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法制和法权，腐蚀我们的干部，而我们干部头脑中的旧意识又适应了这种腐蚀，于是乎就被推上了执行错误路线的第一线，压制群众，压制先进事物，逐渐和群众对立起来。严格地说，这是产生新的走资派的原因。由此而产生的干群对立由干部自己负责。

第二方面内容：和干部执行正确路线相对应：我们的干部是毛主席培养的干部，主观上都不同程度地忠于毛主席的，努力改造自己，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去执行毛主席路线。所谓执行毛主席路线，就是直接应用政权力量去改造群众，改造客观，当然群众中旧东西要反抗这种改造，这样也产生了干群对立，这对立的原因主要在于群众中的旧东西。

上述两个方面在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矛盾在人民内部的反映，在社会主义时期要特别注意的当然是第一个方面，这是文化革命的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对革命事业来说，政权是主要的，政权一变色，一切都变了，保证政权的红色，干群对立总是可以逐步在斗争中解决，到了共产主义，干群对立就完全消灭了。

分析干群的两重性，那如何解决干部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主席总结了要以斗私批修纲。

干部经过一年多的锻炼以后，有了进步，但是还要斗私，改造自己，同时批修，这是解决干群关系的第一方面。群众也斗私批修，是解决干群关系的第二个方面。

在斗私批修中，干群进一步结合起来，干群关系大大改善，结果有利于打击一小撮顽固的敌人。群众、干部的斗私批修虽然能解决很多干群关系问题，从而大大地推动和促进“斗、批、改”的完成。然而任何一个政权问题是不可能完全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的，原因是习惯势力很顽强。这里走资派是主要的，干部群众头脑里的旧意识也在起作用，这些旧意识要自觉不自觉地反抗或阻碍新政权的建立，这是阶级斗争长期残酷性所决定的，所以要建立一个新政机构，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力是必要的，它和干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是相互结合的，缺一不可，所谓“强制力”当然包括武力镇压敌人、走资派和任命新的领导干部在内。

□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

（第八章未完待续）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曾 敏（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荣 刚（美国）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李健民（澳大利亚）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赵 桦（美国）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国）	cnd-cm@cnd.org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SIGNOFF）CCMAN